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的制度渊源

蒯大申

[摘要] 要研究和理解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特点,须追溯其体制渊源。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是其宣传教育体制的形成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因急需适应武装斗争要求而发生转变,除了建立健全各级宣传教育领导体制外,党还对进步文化团体的组织领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宣传文化领导体制基本形成的时期。延安时期形成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面貌。

[关键词] 新中国; 文化管理体制; 制度渊源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0)03-0037-08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文化、意识形态的一整套组织机构、方针政策和运作机制所构成。要研究和理解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组织机构、方针政策、运作机制及其特点,还须追溯其体制渊源。

一、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 宣传教育体制

中共初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是党的宣传教育体制形成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即以“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为党的奋斗纲领,以“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1](p.3)}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是党在初创时期的中心工作。因此,初创时期的党高度重视政治宣传教育工作,并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逐步建立健全其宣传教育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

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第二部分关于“宣传”的决议如下:“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

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pp.6-7)}

初创时期党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视,从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对地方领导机构的要求中亦可见出。一大党纲规定:“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1](p.4)}

1923年10月,中共中央颁发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该委员会的职责“在于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2](p.555)}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正式规定,中共中央和党的各级委员会均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议决案》指出:“中央的各部之中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部和工农部。为运动起见中央的各部得从任何机关里征调最有力的同志。中央宣传部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且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种研究会不要纯粹由智识阶级分子组织。”《议决案》同时强调了政治宣传教育工作要有全国性的规划:“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再则政治宣传亦急于有全国的进行规划。所以中央必须特别设一个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应当是真正工作的集合体,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1](pp.245-246)}1925年1

作者:蒯大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月召开的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的新形势,决定加强中央领导机构的建设。会议决定,“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起见,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中央宣传部下应有一真能负责做事的编译委员会”,^{[1](p.376)}并对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和党报党刊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决定,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书记兼宣传部,第二人担任组织部,组织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担任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会之兼取得互换之)”。^{[1](p.381-382)}为了加强和改进宣传工作,1926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由《向导》、《新青年》、《劳农》、《党报》、《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妇女》等党报党刊的主任编辑组成的中央编辑委员会,^{[3](p.189)}主任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兼任。

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将宣传教育工作置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地位,创立了党最初的宣传教育领导体制。这一领导体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党的核心领导成员担任宣传部门领导。二是明确了宣传部门的工作职责:加强党内教育工作,“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政治宣传工作进行全国性规划;“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三是形成了由中央、地方、基层支部所构成的纵向领导体制,各级地方党委相继设置了与中央宣传部门基本对应的工作机构,形成了系统的领导关系。^①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

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此,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也因为急需适应这一斗争要求而发生转变。

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八七会议强调指出:“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现时秘密状

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根据这一精神,会议要求“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传播之于全国。机关报之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之。政治局之下应设一特别的出版委员会,专掌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责任。北方顺直省委(或北方局),南方局,以至上海省委之下,亦应设立出版机关及传播秘密宣传品传单等工作。”^{[4](p.302)}八七会议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宣传部、党报(《布尔什维克》)编辑委员会、中央出版局等机构。

1927年11月,为了纠正党组织分散的弱点,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之下分设职工运动委员会、组织局和党报委员会,组织局下设文书科、交通科、会计科、组织科、宣传科、调查科、出版分配科、军事科、特务科、妇女运动委员会。

这次机构变动的目的是为了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分工负责的执行机制。因此,1928年7月党的六大又逐步恢复了部、委分工负责的机构设置。六大党章规定:“为处决党的各种特殊任务起见,各级党部委员会之下,得成立各部或委员会,如组织部、宣传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等。”^{[5](p.472)}7月20日,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工作机构设置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和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和秘书处,各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局,各部、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929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决议案系统阐述了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宣传工作的任务、宣传工作的路线,对如何建立支部的宣传工作、一般群众中的宣传工作、党内的政治教育作了具体指示,并对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决议案指出,“宣传教育是实现党的任务的经常的基本工作”,“宣传工作必须成为每个党员乃至每个赤色工会会员的工作”。决议案还规定,“各级党部必须有专门执行宣传工作的组织”。“中央宣传部应该是全国宣传教育工作的最高指导机关,他不只是对中央的宣传工作负责,而应当是对全国的宣传工作负责”。中央宣传部的组织机构下设审查科、翻译科、材料科、统计科、出版科、编辑委员会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省委宣传部最低限度应有审查科、材料科、统计科的组织;地方党部及区委应当尽可能的建设宣传部;支部干事会中应有专门负责的宣传干事。^{[6](p.272-274)}

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规定:“为党的各种专门工作各级党部得设立各部管理之(如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等)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隶属于各级党部。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组织制度均须得中央之命令或同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又有进一步的调整和充实。1939年2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干部教育委员会。同年8月,干部教育部与宣传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1940年10月,又改称宣传部。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后,决定将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更名为《新中华报》。同时将红色中华通讯社^①更名为新华通讯社(新华社)。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坚持宣传工作。除了建立健全各级党的宣传教育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党的宣传教育机构的作用,党还对进步文化团体的组织领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使上海成为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中心。1927年冬,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人创办了太阳社,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创办了创造社。党密切关注他们的活动,并及时给予组织和指导。1928年7月,党的六大制定的关于宣传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现时情形之下的基本任务即为准备新的广大的革命潮流高涨之到来。”“此种任务需要党的宣传工作之根本变动而增加对于扩大群众工作的注意。”并指出,“宣传之另一种的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参加这些团体会议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建议以及报告苏联状况等等,——这一切,地方党部都必须利用以为扩大自己宣传工作与利用一切公开可能的基础”。^{[5](p.414,419)}10月1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通告,要求设立“一普通的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5](p.618)}

根据这一要求,党的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以“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6](p.273)}1930年初,党根据进步作家统一自己组织的要求,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于3月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鲁迅在成立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界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为便于统一领导这些文化组织和团体,1930年10月,“文委”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潘汉年任书记。参加“文总”的

共有八个左翼文化革命团体,其中阵容最大、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是“左联”和“社联”。

三、延安时期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宣传文化领导体制基本形成的时期。延安时期形成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面貌。

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在延安时期的一个关键性事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个对后来影响深远的历史性事件。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中共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三风”,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就是要克服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教条主义,以提高党的战斗力。延安整风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深化了全党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认识,深化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认识,并使之成为开展工作的政治、思想依据。因此,毛泽东后来评论说:“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7](p.298-299)}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了“左”、右两种错误,形成了一个集中、统一、高效的文化领导体制。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全党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此后一直到1942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党内高级干部进行了整风学习,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作了充分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②的报告。2月8日又在延安中央宣传部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负责,直接领导中央直属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陕甘

① 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创办于江西瑞金。

② 此报告后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文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学习委员会。同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了以下事项:一、关于总学委巡视团的工作,同意李富春所提巡视团会议中各巡视员的分工,以后每星期巡视团汇报时,总学委同志都可参加。二、加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决定王若飞、陈伯达、邓力群参加编辑委员会,由康生领导编委工作。三、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胡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四、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由总学委在学习时期轮流抽阅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的笔记(由总学委通知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五、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以后总学委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并通报时事、政治和工作等问题。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成立,对加强整风学习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统一全党思想,统一全党意志,进而达到全党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对此,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①会议上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他说:“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8](p.414)}因此他斩钉截铁地说:“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8](p.415-416)}毛泽东在这里对中央核心领导层讲得很清楚,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大问题,比“延安失掉”要重要得多!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成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9](p.387)}再次说明了“统一思想”是整风运动的核心目标。

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作出了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大决策。决定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

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这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为统一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行动步调,使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而采取的一项领导体制上的重要决定。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著名的“三月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中央领导机构再次进行了重大精简和调整。决定指出:中央机构调整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和工作部门的设置及职权作了重大调整,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责。会议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着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并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会议还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9](p.485-486)}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和强调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地位,调整和精简了中央机关,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领导体制的这一重大转变,也体现在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上。“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9](p.486)}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秦邦宪)、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传委员会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的工作。^②

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统一,具体体现在党校、党报、出版、文艺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中。

1. 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和教育培训高级干部的重要机构,是党内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历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① 中央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是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决定成立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目的在于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② 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兼任秘书。组织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创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底,中央决定在瓦窑堡恢复建立中央党校,董必武任校长。1937年1月,中央党校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成为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10](p.21)}

1941年12月17日,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由邓发、彭真、陆定一、王鹤寿、胡耀邦等组成。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撤消原来的“党校管理委员会”,确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同时决定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并创办党校学习报,由彭真负责,陆定一副之。^{[11](pp.354-355)}一年后,根据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1942年以后,中央党校还增设了新的管理机构,从学校总部机关、各部及附属的组织教育科、秘书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组织系统,并配备了专职政工干部“组织教育干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党校的管理机构和规模也迅速扩大,在1944年初至1945年夏中央党校的鼎盛时期,全校人数共约6000多人,其中一半为教职员。 ^{[12](pp.165,127)}

从1941年到1943年的几次领导管理体制的调整、改组,中央党校基本完成了以组织严密、集中统一为目标的体制建构,为全党统一意志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加强和完善党内理论研究和干部培训制度,中共中央还对延安各校的功能定位作了明确规定:(1)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2)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3)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4)延安、鲁艺、自然科学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要求各校的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必须与各校具体目的相适合。^{[10](p.21)}

同时,为了加强对延安各校的具体管理和领导,并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中央规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安、鲁艺、自然科学学院直属中央文委。要求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中共中央还对学校的政治教材、生活设施、行政组织、学习风气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

2.党报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起就非常重视党报工作。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中共中央相继创办了中央一级机关报刊《向导》^①、《新青年》^②、《前锋》^③。党的一大以后,党报党刊出版工作由中央局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④、“报纸编辑委员会”,非常重视从组织上完善党报管理体制。

中共中央到延安后,党报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大加强了党报的宣传、指导功能。1941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停办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将该刊与新华社编发的《今日新闻》合并,在延安出版大型日报《解放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博古(秦邦宪)任社长,杨松(吴锦铭)任总编辑。毛泽东5月15日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中写道:“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登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13](p.54)}

《解放日报》创刊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该报以大量篇幅报道苏德战争的情况,同时发表了不少评论,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分析,但也造成了过多刊载国际新闻、脱离根据地群众和实际工作的不良倾向。1942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毛泽东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

①《向导》为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是时事政治评论性的周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停刊,共出201期,蔡和森为第一任主编。

②《新青年》为季刊,是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1924年6月创刊于广州,后来由于形势动荡,实际上是不定期刊,1926年7月停刊,共出9期,瞿秋白任主编。

③《前锋》为月刊,1923年7月创刊于上海(封面假托在广州),1924年2月停刊,共出3期,瞿秋白任主编。

④192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规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只对中央全体大会报告,遇有必要时,更可以向全国大会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同时指导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的同志”。参见《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页。

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要从根本上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党的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决定委托博古根据会议讨论,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14](p.487)}

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解放日报》改造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8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还指出: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关于办法问题,毛泽东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优秀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会议决定,由王稼祥、博古、凯丰、胡乔木、余光生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14](p.488)}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那么怎样才能办成一份“名符其实的党报”呢?通知指出,“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11](pp.358-359)}“党报不但要求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息息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这是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这是办好党报的必要条件之一。”^[15]3月31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集《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并讲话。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即日起,报纸版面进行改革,使之“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8月

25日,陆定一接替因病住院的杨松,参加编委会工作。1943年3月,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撤销中央党报委员会,改由中央宣传委员会统管。

为了把党报办成“真正的党报”,中央对各地报纸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和整肃。1942年,各根据地的宣传工作曾发生一些不适合当时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军致新军^①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8](p.454)}1942年4月10日及之后一段时间,《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学生自杀的消息。毛泽东发现后严厉批评《解放日报》“仍不和中央息息相关”,报纸“尚未成为真正的党的中央机关报”。他明确指出,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并表示《解放日报》的几篇社论仍有错误。毛泽东重申,以后凡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须与中央商量。^②对于其他根据地的报纸,也提出同样的严格要求。毛泽东在1942年9月15日给陈毅的电报中要求:“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9](p.455)}

1942年10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8](pp.454-455)}1943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指导工作,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9](p.485)}

经过一系列的改版、规范、整肃和改组,大大加强了党报的集中领导,大大加强了党报的党性、战斗性和群众性,使党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8](p.441)}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3.出版

从1936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到1947年3月最后撤

①新军,即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

②陆定一1942年9月5日在《解放日报》、新华社第22次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的上述批评意见。参见《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第18页。

离,一共10年时间里,延安先后出版了约20多种报刊和400多种书籍。^{[16]p.23}延安主要的出版机构有解放社、新华书店、华北书店、大众读物社等,另外,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问题研究会、边区文化教育研究社、解放日报文化供应部、边区音协编译出版部、敌情编委会、印工合作社等机关团体,也或多或少地出版了一些书刊、地图、年画等出版物。^①1938年创办的解放出版社是中共中央在延安设立最早的,也是出版书刊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出版机构,除了编印闻名遐迩的《解放》周刊外,还承担了由马列学院编译的马恩列斯著作以及其他学术文化团体著译作品的出版任务。新华书店独立建制以后,兼事出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及《整风文献》等著名出版物,均由新华书店总店刊布印行。1941年冬,中央出版发行部改组为中央出版局,秦邦宪兼任局长,许之桢任秘书长。新华书店总店直接由中央出版局领导。

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出版活动,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因而表现在出版物上便带有鲜明的党性特征,党报与党刊、党的领导人著作、党的政策文件、党的历史文献、马列主义著作,被当作出版的首要任务,成为根据地出版物的重中之重。^②

194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统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延安出版工作,目前缺少一个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的机关,因此在工作上发生许多不合中央宣传政策及偏废、重复、无系统、无效能的现象。”出版的统一集中管理,必然要求建立相应的审查制度。除了在出版机构内部执行逐级审批的程序之外,还须在外设立审查监督机制,以确保出版物的党性。因此《通知》同时指出:“兹决定中央出版局统一指导、计划、组织全延安一般编辑出版发行之责,中央宣传部负统一审查全延安一般出版发行书报之责(中央书记处及西北局常委会直接出版的书报除外)。”^{[11]p.370}从此,延安及各根据地的出版工作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逐渐被纳入集中统一管理的轨道。

4. 文艺

毛泽东把文艺工作视为党的宣传工作^③,把文艺工作者视为“文化的军队”,这一思想在延安时期成为中共领导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要求党的宣传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中心任务,无条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力求使这种宣传完全符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符合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思想。与此要求相一致的是,要求党的宣传工作者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毛泽东和中央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包括担负宣传任务的党员,不经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各级领导同志的文章,应经过同级党委或党团适当人员的审阅。各地不应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在宣传工作上,也必须严格执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文艺工作者既然是“文化的军队”,那么就同样要求遵循党的组织原则,遵守党的纪律。于是在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化人被组织起来,成为革命体制中的一员,成为“齿轮和螺丝钉”,进而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整风中思想改造的力量和文化管理体制的强力规范,使延安文化人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1944年夏天,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短短43天的走马观花,赵超构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敏锐地发现,“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人们对生活问题、政治问题等的看法几乎都“千篇一律”,人们的思想“刻板一致”,“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就连“他们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准确。”^④

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延安及各根据地的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及边区文协等机构内。延安的文化机构和文化社团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组织化特点,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入各类行政组织内,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被组织在一个严密的体制之中。

1938年4月,毛泽东参与发起创立鲁迅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宣言》指出:鲁艺的成立,“是为了服务于抗战,服务于这艰苦的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使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一年之后,中央明确规定了鲁艺的教育方针:“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17]p.786}

①参见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5-695页。

②194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指出:“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地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应当大量地印刷和发行各种革命的书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③毛泽东说:“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工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页。

④参见赵超构:《延安一月》,载于《赵超构文集》第2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

初期的鲁艺像抗大、陕公等学校一样,采用的是军事学校的学生编制形式,即大队和区队的组织体制。学生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完全集中在大队长和区队长的指挥下。后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比较重视文艺工作的管理特点,他认为,这种管理方式不适合鲁艺这种性质的学校。在他的提议下,鲁艺把“偏重自上而下的军队式的‘管理制’”,改为“领导与自治并重的、委任与民主并用的制度”。^[17](p.795)]但是,即使是比较注意发扬民主的李维汉,也非常强调组织性、纪律性,他强调:“我们必须提倡服从纪律,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谈到学生会工作时,他说,学生会应该有它自己的活动,但必须“直接属于政治指导机关,受机关首长直接指导”。^[17](p.797,795)]

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创作活动也逐渐被纳入组织化的文艺生产管理体系之中。鲁艺建校初期,歌剧《农村曲》和《军民进行曲》等剧目都是集体创作的,其主题、结构、人物等,都是由集体讨论设计安排的。鲁艺还在教学计划中专门安排时间,组织学生到农村和部队实习。在这样的文艺创作中,作者必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对生活 and 人物进行目标明确的选择、加工、组合与塑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以后,毛泽东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曾特地派潘汉年找到沙可夫,请他创作一部以表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题的话剧。沙可夫接受了任务,关起门来,写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话剧《团圆》。

更典型的案例是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这是一部集中了领导、专家、群众各方面的思想、智慧、经验和情感的艺术作品。晋察冀一带民间好几百年就一直流传着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说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根据抗战胜利后时局的变化和中央的精神,从“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中,发现了赋予这个民间传说新意涵的可能性。周扬明确提出:“鲁艺”要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于是,周扬便搭建了以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为总负责的,由编剧邵子南,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

音乐系的作曲家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组成的创作班子。作家和艺术家们遵循这一明确的意向,设计情节,编写故事,塑造人物,安排结构,创作音乐,并提炼出歌剧《白毛女》的思想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观看了演出。演出获得极大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央领导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办公厅的人还就第三点意见专门作了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很久之后演员们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观点。^①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过程,充分反映了延安文艺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号召。他说:“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8](p.348)]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延安时期开始体制化、定型化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体制,在全国范围得到了更强有力的推行,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的高度政治化、高度组织化的做法,得到了更广泛的实施。延安文化体制成为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下转第49页)

①参见张庚:《回忆延安鲁艺的戏剧活动》,载《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3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版。贺敬之:《〈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载艾克恩主编:《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

给和创新;另一方面是帮助国内资本走出去,包括建立和发展国际矿产、能源和产权交易所,为国内企业投资国际矿产、能源和产权就近提供平台,并以此为平台,争夺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和话语权,同时以优惠政策鼓励和发展非主权类对外投资基金和国际并购投资基金等。

人民币逐步国际化和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为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提供了突破口和着力点。

2009年7月6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率先在上海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是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还需要解决人民币跨境借贷、境外人民币回流直至人民币最终自由兑换等一系列问题。上海应抓住机遇,在人民币国际化领域先行先试,并以此为动力,加快上海金融发展国际化进程:应加速推进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的建设,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部际协调机制争取最终在上海建成独立的、市场化运作的国家清算银行;应大力发展人民币基础金融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人民币利率和汇率衍生产品;应放松管制,允许国际开放机构、外商投资企业、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人民币债券;应大力推动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板的建设,尽快启动符合条件的优质境外企业在上交所人民币计价上市。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国际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五大综合性国际金融中心无一不是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同时,航运金融和贸易金融本身也是金融发展重要的支撑点和成长点。与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建设相适应,上海应大力发展航运金融和贸易金融;应大力发展多元化、多层级的船舶融资和贸易融资市场;应积极发展海上保险及再保险市场;应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探索建立和发展船舶融资证券化、保险风险证券化市场,推出航运燃油期货、运费指数期货、汇率和利率衍生品等新的金融产品;应支持航运企业、贸易企业和金融机构组建航运和贸易产业投资基金等。

后发的金融中心建设中政府的扶持也是必不可少的,上海也应有意识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完善为市场服务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和支付等手段,培育和发展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融资担保、会计审计、法律服务、投资咨询、融资担保等中介服务机构,加强金融法制建设,有序放松金融管制的同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上海在历史上曾经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中心漂移的过程可能会加速。相信经过积极而务实的不平衡发展,上海在2020年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短期目标一定能实现,并为在21世纪中叶进一步建成整体平衡发展的全球金融中心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屠光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路径和方法[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8,(6).
- [2] Hirschman, A. O.,1958.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 [3] 宋国明.加拿大矿业证券市场[J].国土资源情报,2005,(10).
- [4] 赵兰亮.国际金融中心之路香港走了130年[J].当代金融家,2007,(11).
- [5] 孙奉军.新加坡金融中心三部曲[N].上海金融报,2007-12-25(A06).
- [6] Krugman, P. R., 1991.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责任编辑:晓 凌

(上接第44页)

-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9)(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 [7]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0]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2] 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13]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 [14] 吴葆朴等编.博古文选·年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 [15] 党与党报[N].解放日报,1942-9-22.
- [16] 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
- [17] 李维汉.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1939年4月10日)[A].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 [18]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云 尔

Firmly Establish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Defense and Army Organization:

Hu Jintao pointed out emphatically that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the important guiding line of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my. To carry out this important thought, the instructive position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which, determined by the essential relation between our army and part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rmy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society and also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to solve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army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army construction to develop rapidly and soundly. (XU Zhi-gong)

State-owned Economy Must Be Expanded to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ispute in develop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whether or not to exert the dominating role of state-owned economy. Some, in the name of anti-monopoly, smear state-owned economy and tried their best to weaken and even to eliminate it. This paper,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facts, tries to prove the so-called anti-monopoly is harmful to the people and party. On the basis of unified knowledg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ate-owned economy, maintain the dominating position of the economic artery and promote the change of the metho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XIANG Qi-yuan YANG Cheng-xu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Metho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change of the metho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nternally related, and the latter is calling for the forme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s the central drive for the change in the metho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o improve independent innovative capacity, deepen the refor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are the optimal path to accelerat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romote the change of the metho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caus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XIA Dong-mi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tudy-oriented Party and the Building Path : To resear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y-oriented party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build Marxist study-oriented party. The study-oriented party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advanced study concept, definite goal, fully established study system, sustainable innovative capacity and good guiding function of the society. To build study-oriented party, the leading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study and work closely combined, contents are arranged scientifically; study guarantee system to be established, guiding promotion work strengthened and atmosphere made. (WANG Bing-lin)

Deng Xiaoping Concerned about the Distribution in His Late Years : Distribution is a problem that Deng Xiaoping had been thinking about in his late years. Frankly he admitted that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poor and the rich would naturally arise and pointed out sharply that the larg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ll cause sharp conflicts, which will inevitably influence the situ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He pointed out emphatically that if wealth is possessed by few, we will fall into capitalism. He expounded that the advantage of socialism is common wealth, which is the intrinsic matter of socialism. (LIANG Zhu)

The Source System of the New China's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the basic property and basic features, we need to trace its system source.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system was formed in the initiative period and great revolutionary perio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War of Land Revolution, the system changed due to the needs of armed fighting and more work had been done in leading the advanced cultural groups. During the period in Yan'an, the system had been in shape and the system and a series of policies had determined the basic frame and basic appearance of the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the New China. (Kuai Da-shen)

The Developmental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Shanghai as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in the Post-Crisis Era: Shanghai's fast pace in 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is the important strategy of the country in the post-crisis period. In doing so, either self-effacement or conceitedness should be avoided. From the past experiences, imbalanced development is a universal strategy and the accumulation effect may promote the imbalance to balance. The long term goal of Shanghai is to build into a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center like New York and Tokyo but in the near future,

imbalanced strategy should be adopted and in areas with full conditions, brave trials should be made. (YIN Chen HE Xue-hui)

To Choose the Low Carbon Path on the Basis of China's National Situation: Low carbon economy is considered as a technical field and new energy and reduction of emission is the main direction.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the choice of a living pattern and developmental path is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carbon emission. In terms of China, a path of low energy consumption should be chosen. Therefore, the divers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ecessary. Low carbon economy can also promote the divers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while the government promoting low carbon economy,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social mechanism should also be cultivated. (DAI Xing-yi)

Carbon Reduction in Low Carbon Development and Policy Orientation—A case of Emission Reduction in Architecture: Low carbon development should be centered on reducing carbon source and increasing the carbon currency. The key point is to reduce carbon source in industry, architecture and traffic. Architecture reduction is conducive to industrial diversion, expansion of energy recycling and reduction of ineffective transportation. (ZHANG Xiao-li)

Interpreta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Soviet Textbooks of Marxist Philosophy : Since 1950, the textbooks of the Soviet Marxist Philosophy gave a lot of interpretations of infrastructure, which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alin. In Marxism and Linguistics, Stalin explained infrastructure, and his points that "infrastructure is the view of a society about politics, law, religion, art and philosophy as well as facilities to conform to these views" had been widely publicized and had wide influence in Soviet Union and foreign countries. (HU Wei-xiong)

CPC's Anti-corruption Thought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Typical Cases : From 1932 to 1934,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arted a large-scale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are several typical cases, such as Xie Busheng case, Tang Daren case, Zuo Xiangyun case. Through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se typical cases, we will explo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Soviet anti-corruption track development, and sum up historical experience to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for today's anticorruption. (GONG Ru-min)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Marxist Popularization: In realiz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languag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hile sticking to value orientation, the language art of Marxism should be closely related to tradition and reality. Only after clarifying the elements and features of language, the spread of Marxism can be widely made and the attraction of socialism ideology can be strengthened. (ZHU Xiao-xiao ZUO Hao-ji)

Economic (Financial) Crises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Since the birth of capitalism, economic crises have been affecti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reas in the world an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apitalism, different crises have appeare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know economic crisis and its features and forms in different stages. (ZHU Bing-yuan XU Lu)

Considerations of Model and "China Model"—also on the Developmental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Model, which was proposed long ago, caused little atten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I am not for the term "China Model" and advocate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asons lie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re have been some models in the world, but none of them has been successful. Second, the nature of China model proposed by foreign experts reflects their knowledge and assessment to China's development, which may be used as reference and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ird,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essential theory to guide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This theory is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far from maturity and thus, there is no need to call it China model. (LI Shi-kun)